

海軍教育與近代中國

吳相湘

包遵彭清季海軍教育史之介紹

中國雄踞亞洲大陸，海岸線曲折綿延一萬數千哩，自古海外交通發達，四百五十餘年前，也就是西曆十五世紀之初，明鄭和率領強大船隊遠征南洋印度洋，是人類歷史上大規模揚威海洋的首一紀錄。不幸近百年來，由於歐洲國家「船堅炮利」，我們遂喪失制海權，淪為「次殖民地」。

歷代興亡起伏的大勢中，體現出海之作用和制海權對於國勢隆替的關係非常密切；包遵彭教授會於其手撰「中國海軍史」自序中沉痛指陳：「十七世紀以後……中華民族被迫退出此一歷史舞台（海）；若果再不作一番回顧省察，我們將永遠『望洋興嘆』而不知病痼之所自由，抑且將永遠困於大陸國之舊染，習為固常視為當然，而不知自拔。除非立即作系統的歷史的研究，與客觀的分析，以呼喚海國精神之再生並保持不墜。」

「中國海軍史」是民國四十年二月刊行，在這十七年中，它在國外所受到的重視遠超過國人對它的注意。例如美國康奈爾大學畢乃德教授（Professor Knight Biggerstaff）之「中國

近代初期官立學堂」(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 in China)，哈佛大學

刊行羅嶺森博士(Dr. John L. Rawlinson)之「中國向海洋發展奮鬥史——一八三九——一八九五」(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芝加哥大學王季新博士之「中國知識份子與西方：一八七二——一九四九」(Y. 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以及哥倫比亞大學富路德教授(Carrington Goodrich)與日本漢學家斯波義信等對「中國海軍史」多予以徵引；西班牙海軍大學及巴薩隆那大學教授 Frayncisco F. Olea Munids 氏更根據此書譯述略加損益撰成「中國海權之研究」(El Poder Naval China)一書。

海外學人對「中國海軍史」之如此重視，應基於中國海權之興衰實關係世界大局，而在此以前沒有一冊如此性質與內容的書，更重要的是：著者保藏有民國初年北洋政府海軍部舊檔，利用這些稀有資料充實了書中有關近代部份，而這些

資料並且是民國四十六年中央研究院刊行的「海防檔」中所沒有的。

民國四十四年相湘刊行「清季園苑建築與海軍經費」一文，可說是自幼有意學習海軍末克如願的一種心理補償。近十數年專心致力民國史實的研究，未暇再及此，但對中外刊行有關中國海權史實的書籍和雜誌論文仍盡力搜集閱讀。多年來先後發現包遵彭氏又陸續刊行「中國古代海洋文化」、「漢代樓船考」、「元代海運制度及航海學術」、「海洋文學與航海神」、「鄭和西洋之寶船考」、「清季海軍經費考實」諸篇；尤其今年七月刊行的「清季海軍教育史」(國防研究院印行)更值得注意。因其充分運用近年新出史料與論著，對其「中國海軍史」有關章節重加增刪改寫，不抱殘守缺而再接再勵以期日新又新，應該是效法一百餘年前湖南邵陽魏默深(源)於鴉片戰爭後撰述「海國圖誌」的精神。

「海國圖誌」初刊本六十卷，默深先生力求

對國人提供知彼知己的新知識新方案，歷經多次增刪訂補，終成一百卷定本。不幸其苦心孤詣的巨著竟不為國人所注意，却成爲日本明治維新思想推動力的一重要因素。更不幸的是今日臺灣書賈在流傳珍籍善本以復興民族文化的旗幟下竟只知取「海國圖志」六十卷初刊本影印！真是反其道而行大開倒車。

「清季海軍教育史」之值得介紹，在其能從根本上指出中法戰爭（一八八四）中日戰爭（一八九四）中國海軍連遭敗績原因及其後深遠的影響。這是「中國海軍史」未曾具述，更是多年以來許多論述無法觸及的；因爲著者保藏有北洋政府海軍部舊檔，可以探本溯源。

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設立福建船政學堂，是清代創立新式海軍學校的嚆矢，也是後來北洋、南洋、粵洋海軍學堂的楷模。故其一切影響中國海軍至巨——不幸，這一福建船政學堂在開辦招生之初，即遭受傳統社會惡習氣的侵襲。「教育史」會再三引據北洋政府海軍部舊檔中未刊之梁同樸撰「馬江海軍學校」稿指出：「原議招生不論漢回蒙一例考選。而應者終渺。閩人本習航海事，開化較早，所以應選者本省之人爲多。而粵疆接近閩省，亦稍與焉。迨留美學童回華補習，是爲駕駛之第八屆，粵人則居其多數。厥後遴員赴港選取學業可造之學生數十人，分駕管兩科，其間除閩粵外，略有他省之二二人而已。」其時應考生童，冒名頂替者居多，以後續招，改爲在局生童，各舉所知，畫押保送」。著者綜合史料對於這一推舉保送辦法，認爲固可主動延

致優秀生童，並瞭解其家世。然而積久弊生，遂以在校生童保舉爲招生之常例，不免相互援引鄉黨，種因了此後數十年間海軍鄉土觀念與門戶學派之分歧。著者沉痛指陳：「鄉土畛域觀念，首先作用於南北洋海軍自立藩籬不相統轄，這是光緒十年中法海戰失敗的最大因素！」十年後中日甲午戰爭之失敗……李鴻章於光緒廿年八月二十日奏報所謂：「以北洋海軍一隅之力，博倭人全國之師。則係極沉痛之呼籲」。

在引據文證指陳這兩次失敗因素以後，著者又續指陳：「這種鄉黨相互援引的積習，後來海軍全局隱隱受其影響，至民國以來，一仍舊貫，莫相統屬。氣類既乖，浸至形成學系、宗法、畛域之傾軋，各立門戶，相互援引，以民國廿六年爲例，海軍部屬官佐總數爲二、五六三人，福建籍爲二、一三九人，即占百分之八四、四三。廣西貴州山西陝西甘肅雲南及東四省無，其他各省合共只占百分之十二。海軍部本部官佐計二三四人，福建占一八七人，江蘇二三人，安徽四人，浙江二人，山東四人，廣東五人，江西一人，河南二人，湖南四人，四川二人，餘各省均無。這真是「一畸形現象」。

福建船政學堂除延聘西洋教習來華講授以外，又會挑選成績優良學生出洋深造，光緒三年至十一年間計派遣三次，共七十六人。不幸這些留學回國的人才竟未受到重視。「教育史」引舊檔「船政前學堂」抄稿有云：「其時，船政大臣黎視學生不甚重，其先行回華者派在工程處出圖製造各兵船，所有留洋多習槍炮，轉無正位置，以故

爲北洋調用者居多。船政因海關解款不足，未能進行。自此之後，不添新機，不事整頓，人才因此散失，其所學均非所用。未幾，西洋逐漸進步，各生徒所學已成陳績矣。」至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連同第三屆出洋回國者，幾亦全另謀生理。「海軍實紀」引邊寶泉奏疏有云：「聞船政學生學成回國，各散處無事，饑寒所迫，甘爲人役。上焉者或被外國聘任辦事，其次亦多在各國領事署及各洋行充當翻譯。我才棄爲彼用，我用轉需彼才，揆諸養才用才之初心，似相刺謬」。真沉痛語。福州嚴幾道（復）就是比一情勢中的顯明例證。

這真是人才、金錢、時間的大浪費，也是近百年中我國與日本先後興建海軍並期使國家近代化之所以成敗的重要關鍵；正如上述邊寶泉在同一奏疏所指陳：「日本現在執政大臣，多與我第一屆出洋學生同堂肄業；豈中國學生資質盡出入下哉？！蓋用之則奮發有爲，人人有自靖自獻之思，不用則日就頹落，人人有自暴自棄之境」！今按一百餘年前，滿清當政自認識西洋「船堅炮利」而有所謂「自強運動」，這在千百年頑固蔽塞虛僞積習中，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的，但沒有和日本明治維新的君臣一樣自學習西洋礦冶工程以及政治法律等着手，也就是說沒有注意造船所需要的重工業，同時更沒有認識新式海軍是工業革命後的產物。西洋政治法律社會經濟均因工業革命而大革新的優點，祇知向西洋「購船炮」，這正如經手購船炮的海關總稅務司英人赫德（Robert Hart）所形容的只是「無根之花」！

何況西洋人之所以願意讓售船炮，決不是協助中國鞏固國防，祇是為嚇阻橫行於中國海上的海盜，保障歐洲商船東來航行的安全。故自福建船政學堂創立之始，一切規章均仿行英國，着重技術訓練，沒有國家目標，社會上鄉土畛域的惡習侵襲學校內，英國教習又很可能於有意無意之間發揮對殖民地「分而治之」的手法，這兩者相激相盪，後患自然不堪想像。「教育史」指出辛亥革命廣東光復之初，黃埔海軍學校釐定教育宗旨，揭校訓四條：一曰愛國，二曰服從，三曰名譽，四曰樂群。同時煙臺海軍學校章程開宗明義揭示：「本堂為培養海軍士官而設，國之強弱繫焉。故尋常智育體育之外，德育尤所注意」。應該是針對過去失敗教訓而力圖有所補救。然而積弊既深，祛除維難，「教育史」指陳：「第二次中日之戰結束，中國海軍百年來遺留下盤根錯結之歷史癥結，因國家之統一復興大勢所趨迫，各自為政，各立門閥之積習，才有一全面徹底之改革」。

國家意識的培植對海軍教育之重要性，由「教育史」第十一節「附論民國初期海軍教育」中之青島海軍學校，尤其海軍電雷學校的發展，可以顯現。如蒙所周知「八一三」淞滬戰役襲擊日本艦隊旗艦「出雲號」的壯舉，即電雷學校學生冒險犯難的傑作。「教育史」在具述各地船政學堂的史實以後，對於許多海軍人才未能「人盡其材」，不勝惋惜。但指出如嚴復、詹天佑、張伯苓（壽春）在介紹新知於其他方面實有貢獻。但筆者以為這「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現象，就國家發展全局上衡量無論如何是得不償夫。

海軍教育是中國近百年來自強運動的開端，也是邁行近代化的一大步。祇因政治制度與實際、社會觀念與環境、經濟的建設與發展，尤其民族國家意識的培養等等沒有同時全面進展。「無根之花」自然不能顯出鮮麗。

近二十年來海軍教育與海軍既已徹底改革，而一般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界的門戶宗派觀念尤其蔽塞自私却與日俱增。懲前毖後，殷鑑不遠，「清季海軍教育史」實在是一「歷史的鏡子」！值得大家用心照照鏡子。東方雜誌群育專號「我們的話」：「國步維艱，時乎不再」！事實上也不容許我們再為後代「子孫種惡因」了。

(上接72頁)

中。那天坐無虛席，討論的時候，發言之踴躍使會議延長約四十分鐘。其後，兩個發表論文的人就被一位寫科學新聞的人所訪問。從發言的人所提出的意見，可以看出這些人都在從事這個問題的研究。在會議中，幾個有名的化學家都出了席。他們就是 Henry Eyring, Henry Frank 等。Eyring 在前一天，一直搶着發言，這一天却不大說話。Frank 對「奇異的水」的意見是：這個問題，似乎是表面化學的問題，這種水的存在不大可靠。可是他又認為大家仍應注意這個問題的發展，因為這批俄國人以前也曾發表過許多別人不同意的東西，結果他們都沒有錯。這個問題使得許多科學家感到困惑與煩惱。

「奇異的水」的重要性是：如果這種水真能存在的話，那末，液體的構造及表面化學的理論都將為之改觀。許多以前不瞭解的問題，都可能從這一研究獲得一點線索。現在許多人都已在夢想：如何製造大量的「奇異的水」？如何利用「奇異的水」？但是，在「奇異的水」的存在及成因未經其他人證實之前，這些想法，都未免言之過早。

這是個棘手的問題，也是個有趣的問題。科學的研究，往往就是在無知，狂妄與不斷的探討中，獲得進步。

(民國五十八年四月廿日寫於美國化學會閉幕之後。)

附記：本文寫畢，隨即看到兩篇關於「奇異的水」的最新報導。一篇刊於 Chem and Eng, News 四月廿一日出版，p. 39。另一篇刊於本年四月份出版的 Nature, Vol. 222, p. 159, 此篇為英國 Unilever Research Laboratories 的人所寫的。也可說是西方學者研究這個問題的第一篇報告。

※ ※ ※ ※ ※